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我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与儒法斗争

北京市总工会
天津第二棉纺织厂
北京前进棉织厂
北京色织厂
工人理论组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程,也深刻地影响着古代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与纺织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是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全面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历史使命。批判历代儒家在纺织技术领域推行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肃清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进一步树立奴隶创造历史的观点,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养蚕治丝 奴隶创造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恩格斯也曾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耕织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在纺织方面,我国最早地发明了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技术,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是我国民族珍贵遗产之一。

早在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经用骨针穿麻缕缝制兽皮衣,把天然的石珠、介壳和黄绿色的砾石串起来作装饰品,并且会应用赤色铁矿粉作为颜料。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六千多年),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已经能够制造器型优美、花纹生动、颜色丰富的彩陶,能编织均匀细密的竹席;并且在编织的基础上逐渐发明了纺织技术,开始用竹纺轮纺麻线,用原始“腰机”织麻布,“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距今四千多年前,我国勤劳、勇敢、智慧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发现野蚕能吐丝,经过采集饲养和多年的积累经验,创造了养蚕、植桑和缫丝、织造丝绸的技术。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我国最早的丝织品实物,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有平纹素织和挑织出菱形图案的丝织物遗迹,商代甲骨文中也有丝、桑、帛、蚕等象形字。到了周代,文献记载丝织物的种类更为丰富。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我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即以盛产丝织物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丝国”,纺织技术有了相当的水平,比罗马、希腊要早几个世纪。恩格斯说过:“蚕在 550 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

但是,奴隶们创造了丝绸,而丝绸却只能为奴隶主贵族所专用,奴隶们仍然穿麻着褐,并且

“执麻枲，治丝茧”，“为公子裳”。真是寸寸丝绸，斑斑血泪！同时，周朝为了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推行了一套“周礼”典章制度，车马服饰都被纳入“礼治”的框框。“周礼”中的“章服制”规定，自天子以下冕服分十二等级，各级衣服的织造和选用色泽，都必须严格照章办事，否则就是越礼。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长，奴隶制度逐步瓦解。西周以来的“礼”、“乐”等级制度渐被打乱。孔老二怕得要命，声嘶力竭地嚎叫“礼崩乐坏”，拚命地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齐桓公破“五方正色”而穿用紫色衣服，孔老二便大骂“恶紫之夺朱也”，叫嚷“革制度衣服者为畔（叛），畔者君讨”。卫国人浑良夫穿紫色服装越出了“礼治”，就被杀了头。

西汉末期反动儒家头子董仲舒，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用“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毒害人们的思想，束缚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唐儒韩愈也叫嚷“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公然主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完全是孟轲之流“无野人莫养君子”、“治人者食于人”一类强盗逻辑的翻版。在这些儒家之徒的干扰和破坏下，纺织技术的发展也遭受很大压抑。

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在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推动科学技术前进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一切新兴的革命阶级和进步的政治势力，都比较关心和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史上，法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曾起了促进的作用。

法家管仲在齐国任相时，提出“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宣布“民之通于桑蚕，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大力倡导奖励民间养蚕植桑。法家商鞅在秦国变法，明确提出“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主张，号召人们全力从事农业生产，凡是向国家交纳粮食、布帛多的人，是奴隶的免除奴隶身份，是“罪犯者”减轻刑期。商鞅的这一主张促进了秦国的农业和纺织业，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物质基础。法家荀况深刻批判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唯心史观，宣传“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深入实际，总结了劳动人民养蚕的经验，记载了蚕的生长规律：蚕“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伏三起，事乃大已”。在荀况的法家思想影响下，当时的养蚕业有了较大发展。汉武帝时，法家桑弘羊主张丝绸专卖政策，打击了奴隶主和儒家的复辟势力，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也促进了纺织技术的发展。三国时诸葛亮治蜀，重视发展丝织业，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成了蜀国的重要产品。

在法家路线的影响下，从纺织技术到纺织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和发展。战国时齐国织工技巧最著名，丝麻织品通行全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有“齐纨鲁缟”之称。战国时，丝织物已由商代的挑花平纹素织，发展到提花纱罗。在纺织机械方面，由古代的竖机、斜机而创造了平放的织机。平放的织机是用脚踏板的、腾出的双手就可以作更复杂的操作。

“丝绸之路” 千秋史证

西汉初期，汉承秦制，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纺织技术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在植桑、养蚕方面，大量培植枝嫩叶润宜于蚕食的“地桑”，改善了家蚕的饲料和饲养方法，提高了家蚕丝的质

量。如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重量不足一两,轻薄如蝉翼,就是古代丝绸纺织技术高度发达的明证。在纺织工具及技术方面,劳动人民创造了水力纺纱机和提花机,不仅提高了生产能力,而且还能织造各种纹彩绮丽的丝织品。以后,三国时期魏国的贫苦出身的著名工匠马钧,进一步改良了织绦机,提高工效四、五倍,所织花纹更加精美。

由于丝织品从生产技术到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因而逐渐成为我国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间,张骞出使西域,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一些国家建立了联系;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他第二次出使时,就“贡金币、帛直数千巨万”,用作馈赠的礼物。此后,在中西交通的大路上,便不断有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向外输出,这一盛况一直继续到唐代中期,形成了从汉到唐的千余年间的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

唐初是唐代的全盛时期,统治阶级推行法家路线,法家进步、革新的政治路线,使我国的丝织品在纺、织、染各方面都有进一步的提高,尤以织锦最突出,具有织法明晰、纹饰多彩的艺术风格。大量的丝织品通过我国西部的陆路,分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帕米尔、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到地中海东部一带;北路从敦煌经吐鲁番、疏勒、伊朗,而西达地中海东部一带)运往西亚、欧洲各国。

在汉唐之间,西亚、欧洲对我国丝织品十分喜爱,早在公元十世纪前,我国养蚕缫丝技艺已西传,他们已能用自己生产的蚕丝织造制品之后,仍称赞我国的织锦是“非常卓越的装饰品”。在丝织技术西传的过程中,八世纪中叶杜环的记录是值得珍视的。杜环在唐代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至应宝初(公元七六二年)到过亚俱罗(今伊拉克境内),他看到“绦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隈、吕礼”。由此可知,我国纺织工具已传到“丝绸之路”的西部,中国的手工业工人已在阿拉伯亲手传艺,把中国的丝织技术传播到欧洲。这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悠久的友好关系中,不容磨灭的重要史实。

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这条“丝绸之路”我国境内发掘了大量汉唐时期的丝织品,说明了当时丝织品的品种丰富,图案多彩,配色华丽,编织致密的水平。如1959年在民丰北的一座东汉时期墓葬中发现大批丝织品中,有三种织出铭文的平纹经锦:其中用绛、白、宝蓝、浅

驼、浅橙五色丝绒织成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需要 75 片提花综才能织成,大概是当时制作最复杂的一种织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出土了许多以前未见或少见的丝织工艺品。如 1969 年在阿斯塔那一座出土的有大历十三年(公元七七八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了一双云头锦鞋。锦鞋使用了三种锦:鞋面是用四种颜色丝线织成的变体宝相花平纹经锦;鞋里衬是用六种颜色丝线织成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绸,是目前所知唐代最绚丽的一种晕绸锦;鞋尖是用八种颜色丝线织成的斜纹纬锦。整个锦面构图繁缛,形象生动,反映了唐代中期织造技术的高度水平。

出土的古代文物,是当时生活的模写和历史的见证。我国境内“丝绸之路”大量出土的丰富多彩的丝织品,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丝织工艺的精湛水平,同时也可推想到当时在“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的盛况。只是到了唐代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盛行一时的“丝绸之路”,遭到了中断。

“丝绸之路”本是友好往来之路,文化交流之路,但自十八世纪起,西方侵略者的魔爪开始伸向这里。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探险家”、“考古家”就不断出现在这条路上,干尽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二十世纪前半叶,他们更巧取豪夺,大事盗掘,“丝绸之路”变成了他们侵略掠夺的捷径。自疏勒以东,敦煌以西的重要地点几乎无一幸免,许多珍贵遗物,包括大批古代织物被他们抢劫霸占。近年来,苏修大肆鼓噪老沙皇时代的“考古家”、“探险家”,如何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地区活动,作出“贡献”,其新沙皇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女革新家 人民传颂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劳动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提供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而且由于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自然知识,产生了自然科学的萌芽。人类历史初期的那些萌芽状态的自然科学技术就是劳动人民直接参与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的表现,都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因此,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史。

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就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她的一生,深刻地表现出我国劳动妇女勤劳、勇敢、智慧的优秀本质。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北宋中期,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十分激化,当时儒家的反动思想甚嚣尘上,使国家长期陷于“积贫积弱”的局面,因此,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宋代法家王安石、沈括,实行变法,重视耕战,主张“治世之民,无职则耕,未有无事者”,使“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以便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法家的进步路线,使当时的耕织生产得到发展,使纺织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北宋时期,我国已经普遍种植棉花,由于气候适宜,特别是在江淮一带更为广泛。劳动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种棉、织布有很多优越性,“比之蚕丝,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埤之泉苧,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王桢《农书》)棉花的经济实用价值和它简单易掌握的加工技术,已为广大劳动人民充分肯定,因此,几千年来的丝麻纺织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渐为棉纺织副业和手工作坊所代替。

初期的棉纺技术,工具极为简单,甚至用手工剥出棉籽,产量低而又费力;弹花用的是小弓,以手指拨弦弹花,力量微弱,松棉和除杂的效率不高。改革原棉加工技术,使种棉纺织成为

我国劳动人民最广泛的生产活动的是南宋末年的女革新家黄道婆。

黄道婆原籍松江乌泥泾镇,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是童养媳,饱尝了残酷的封建礼教的迫害和虐待。到了青年时期,她以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冲破封建礼教罗网的束缚,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在当地黎族劳动人民的耐心帮助下,学习和掌握了黎族人民纺、织、染的全部工艺。到了晚年,黄道婆回到了故乡,也带回了比较先进的纺织技术。

宋、元代之前,棉布极为稀少。尽管当时我国种植棉花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因为棉纺织工具和方法的落后,仍然不能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

黄道婆积三十余年的实践经验,回到家乡后,改革了棉纺织的“捍、弹、纺、织工具”,推广和革新了去籽的搅车,弹花的椎弓,纺纱的纺车和织布的织机。

黄道婆首先推广了黎族妇女用踏车剥棉籽的方法,“两轴相轧,籽落于内,绵出于外”,提高了工效好几倍。在弹花方面,黄道婆以她改进的大弓椎击法代替了过去线弦小型竹弓用手指弹拨的方法,把当地长一尺四五的小弓改进为“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王祯《农书》)的大弓,利用弹椎来击弦弹棉。这样弹搓出来的棉条均匀不易断,改变了“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陶宗仪《辍耕录》)的落后状况,解决了皮棉供应不上后道工序的问题,“木棉虽多,今用此法即去籽得棉”而“不致积滞”。更重要的是黄道婆将一维手摇纺车,改进为用脚踏的同时纺三维的纺车,这是中外纺织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马克思在谈到欧洲产业革命前的机器发展情况时曾说:“**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见。**”三维纺车具有速度快、产量多、效率高的优点,大大地促进了棉纺业的发展。

由纺纱到织布,在当时还都是直接承袭丝麻的纺织工具,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黄道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验,终于又改制成功了一种棉布提花织机,能织出各种纹样的花布。当时在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音税,一种佩巾)”等棉纺织品,成为全国闻名的精制品。棉纺织生产的发展,使松江由“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变成了富庶之乡。

黄道婆不仅推广和革新了纺织工具,而且还制定了一套从碾籽、弹花、纺纱到织布的系统化的手续,并且积极地传授了黎族人民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音切)花等技术,大大促进了我国棉纺业的发展。黄道婆这位饱尝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迫,被踩在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在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精神鼓舞下,不甘心忍受奴役和压迫,勇敢地挣脱了“四大绳索”的束缚,她不信天,不信命,敢于反潮流,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中的一员女闯将,也是一位促进我国棉纺织业发展的女革新家。

纺织工人 誓谱新篇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纺织技术方面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同时,也是对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林彪污蔑劳动人民只知道“恭喜发财”,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及其散布的“中国文化起源于希腊罗马”的无耻澜言的有力批判。

纵观整个纺织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两千多年我国纺织技术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时起时伏的。发展速度较快的汉唐时期,开辟了著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为我国人民

和中亚、西亚、欧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与文化技术交流做出了贡献。这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封建制度处于巩固和发展阶段,生产力不断提高,突破了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的缘故。在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基础上,法家人物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推行法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和纺织技术的发展。凡属我国历史上纺织技术发展速度迟缓或停滞的时期,大多是处在落后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是复辟、守旧、倒退的儒家反动路线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压抑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所造成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只可能在一定的特定时期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而不可能进行彻底的革命。只有解放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人们的头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短短的二十五年,我国纺织工人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冲天的革命干劲,改造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纺织生产的破烂摊子,使这些旧企业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同时,新建和扩建的纺织企业遍布全国,生产着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的美观大方、花色品种繁多的各种织物。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指引下,一条条新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各地,支援了世界革命,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

毛主席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我国拉向倒退,拉向资本主义的深渊。当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却跑到天津找纺织业的几个反动资本家出谋献计,说什么“中国资本主义”要无限地“大发展”,资产阶级“剥削得愈多,功劳愈大”,鼓吹“剥削有功”;林彪鼓吹“克己复礼”,叫嚷中庸之道“合理”。他们干的都是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历史发展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到头来总不免“折戟沉沙”,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复辟美梦,亿万劳动人民进一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更加激发了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我国纺织工人牢记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的伟大教导,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使我国纺织工业空前大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棉纱单位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高速化生产打破了世界纺织技术的旧框框;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电子技术、射流技术、自动控制等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在纺、织、染等工序和设备上广泛采用,自动化水平大为提高。去年我国第一个电子群控制羊毛衫横机自动化车间已正式投产,**“织布不用梭,落纱不用手,挡车不用走”**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现代纺织原料——化学纤维已大量生产,各种巧夺天工的化学纤维纺织品,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随着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化学纤维纺织技术的日益提高,将会对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们工人阶级决心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奋斗!